

第七章： 人物誌





引言

香港明愛以「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為服務宗旨，轄下各服務單位持守助人自助的原則，歷年來幫助了不少有不同援助需要的人士。本章透過 22 位不同年代的司鐸、明愛員工、義工和服務使用者等的故事¹，展現明愛如何透過多元的服務，實踐「扶助弱勢社群 發展人的才能 致力溝通和解 建立回饋精神」的使命。

力理得神父（1926-2003）

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 P.I.M.E.），前香港明愛總裁；生於意大利北部都靈省（Torino）庫內奧鎮（Cuneo）附近一條名為 Castelletto 的小鄉村，家族世代務農。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政權的統治，力神父目睹生靈塗炭，使他反思生命的意義，並認受了聖職的路。他先到了鄰近的沙路左（Saluzzo）修道院，學習教理基礎。到了 1948 年，他加入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1951 年晉鐸，並繼續在羅馬的額我略大學進修。

1955 年，時任香港教區主教的白英奇主教到訪梵蒂岡，邀請力神父來港傳教。1956 年，力神父來到香港，初時在九龍區協助青年職工小組。1957 年，力神父為了協助青年了解勞工法例和爭取改善待遇，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並與勞工處商討改善工人待遇和福利的方法。同年，力神父被白主教委任為竹園聖庇護十世堂主任司鐸，並擔任公教職工青年會神師。1959 年，力神父被委派往香港天主教福利會工作。

力神父到任時，福利會還未有正式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亦只有他自己和一位祕書，後來福利會才在中環大昌大廈頂樓設立辦公室。當時有些人會到不同堂區重複領取救濟品，因此福利會主要的工作是協調各堂區，避免重複領取的情況出現。因成效顯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後來採用，



力理得神父（左）與艾巧智神父

並建立「中央救濟登記冊」（Central Relief Record），問題最終得到解決。此外，力神父在竹園區服務時，留意到不少難民不懂食用麵粉和奶粉，只好把救濟品轉售。當他到任後，便着手籌建麵條廠，把麵粉和奶粉加工成麵條和奶水，無分種族、信仰分發給有需要的人。

力神父為了照顧弱勢社群，推出了多種創新的服務，例如在 60 年代，社會上仍未對殘疾人士的服務有太多關注，不少殘疾人士的生活範圍只限於居所附近，如何令他們學習新技能和建立社交圈是一大難題。當時有員工建議力神父寫信給附近美利兵房的指揮官，希望他們培訓明愛的青年工作者照顧殘疾人士，力神父欣然照辦。兵房的官兵不單答應，後來還提供軍車協助運輸香港島的殘疾人士到堅道明愛社區中心參與活動和培訓，這批參與者日後更創立了「殘疾青年協會」。此外，白主教意識到本港吸毒問題嚴重，便接納了盧萬展神父（Fr. Silvio Lomazzi, SDB）的建議，成立了「明愛樂協會」，讓福利會參與支援戒毒人士的服務。對於吸毒問題，力神父深感當時的社會普遍不接納戒毒人士，導致很多戒毒人士走回頭路，結果往往是「一人吸毒，全家受害」。明愛樂協會自創立開始，已將協助吸毒者重投社會作為工作目的，而不只限於戒毒的層面。

除了開創多元服務外，力神父亦十分着重員工是否能實踐明愛精神。他曾說：「明愛在培訓職員時，不只是訓練他們如何照顧有需要的人，也不單是職業訓練，而是培養他們具有無條件去愛和服務的精神。」

1982 年 12 月 29 日，薄扶林慈幼會宿舍發生一宗慘劇。盧萬展神父在休息室被勒死，兇手是一名神父認識的戒毒康復者。與盧神父認識多年的力神父不單沒有對兇手的行為感到憤怒，反而開解其他教友說：「若有一天他們為侍奉天主而亡，定會在天家重聚。」其後，不少與盧神父認識的人也主動為兇手撰寫求情信。

雖然力神父長期擔任明愛的總裁，但他為人低調、樸實。與力神父認識超過 60 年的艾巧智神父（Fr. Secondo Einaudi, P.I.M.E）曾描述力神父「做事從來沒有想過一己的利益」。每個周末的休息日，他通常會到明愛位於長洲的營地，種樹、鋪路、主持彌撒。他生活樸素，不穿華麗的衣服，而宿舍也只是一張牀、一尊聖母像和一個十字架，其他空間均放滿文件和檔案。力神父不擅言辭，因此很多工友說神父很嚴肅，不會笑。但事實上，力神父非常關心和照顧員工，所以不少員工私下稱呼他為「老竇」。力神父晚年受到疾病折磨，但仍堅持繼續處理明愛的事務，直至息勞歸主。

¹ 本單元的資料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力理得神父及楊鳴章主教除外）



楊鳴章主教（1945-2019）

楊鳴章主教 1945 年在上海出生，於九龍鄧鏡波學校英文部畢業後，曾從事會計工作。1972 年，楊主教受到上主的感召，獻身事主，到聖神修院修讀神哲學，用了六年時間，完成七年的課程，並於 1978 年晉鐸。在修讀期間，楊主教曾於白英奇主教專業學校任教，自此與明愛結緣。晉鐸後，楊主教曾在幾個堂區服務，其後獲派到美國進修。於 1990 年 12 月，楊主教加入香港明愛，擔任教育服務部部長；2003 年 3 月出任明愛副總裁；同年 8 月獲委任為明愛總裁直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楊主教在明愛任內，建樹良多，包括提出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學的願景和重建明愛荃灣服務中心。



楊鳴章主教

楊主教曾提及當年重建明愛荃灣服務中心的事。當時要將原來三層的荃灣明愛服務中心重建成一座 12 層高的大樓，除了賽馬會的支持外，明愛亦需要自行籌募部分款項，但在籌款的過程中，他備受批評，說他攀附商界、權貴。楊主教虛心接納這些批評，但希望大家明白，為幫助窮人，為籌募經費，要多與人建立關係。因為「沒有人會無緣無故捐款 1,000 萬元給不熟識的人或機構，亦不能只依賴教會支持。我要幫助窮人的時候，是否要找一些資源呢？沒有資源就難以幫助有需要的人。」這亦印證了楊主教為了讓弱勢社群得到幫助，不介意個人名聲，也不計較被他人誤會的胸襟。最終，當時的兩個大項目，即重建明愛荃灣服務中心和興建明愛專上學院的將軍澳校舍，均順利完成。

除了聰明好學、孝順父母和對家人無微不至的關愛外，楊主教畢生步武眾僕之僕基督，致力於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獲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評。楊主教胸懷普世人類，故他樂於接受邀請，成為宗座一心（Cor Unum）委員會成員。他對國際明愛的發展非常關心，也積極配合普世教會步伐，對教宗方濟各推動的「慈悲禧年」和「家庭年」全力回應；對中國教會的兄弟姐妹，也關懷備至，且多方面予以協助。

楊主教處事必全力以赴，即使抱病在身，依然無損他為兄弟姊妹服務的熱忱，確是一位捨己為人的善牧。他明知期限將至，仍燃燒自己的生命以成就他人，就如《若望福音》第 6 章所載「五餅二魚」奇跡中那個小孩子，手上僅有五塊餅和兩條小魚，但都願意全部交出，全心交託基督，結果在基督手上成就了餵飽數千人的驚人美事。

在面對不同職務上，楊主教也不忘祈禱，故常能保持一份喜樂與和平的心境。正如聖保祿宗徒在《得撒洛尼前書》第 5 章 15 至 18 節所說：「要小心：人對人不要以惡報惡，卻要時常彼此勉勵，互相善待，且善待一切人。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

楊主教雖然對教會和社會有莫大貢獻，但從不居功，只以光榮天主為己任。正如聖保祿宗徒在《格林多前書》第 3 章 6 節所寫：「我栽種，阿頗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

雖然楊主教後來獲任命為輔理主教和香港教區主教，但始終心繫明愛。據閻德龍神父憶述，楊主教「對任何關於明愛的事情都瞭如指掌，因為他服務了明愛 20 多年。如果你經過楊主教宿舍的房門外，你會發現他沒有換過門上的名牌，名牌依舊寫着『香港明愛 - 楊鳴章神父，教育服務部部長』，但當時他已經是副主教、輔理主教。（楊鳴章主教於 2014 年獲委任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並退任明愛總裁一職。）」

楊主教匆匆走完他精彩的一生，以深度的靈修樹立了一個在主內充滿活力的基督徒典範。在面對困難時，他依然懷着信德服務天主的子民，也盼望有更多年青人能效法他那種樂主愛人的奉獻精神。



閻德龍神父

閻德龍神父，香港明愛現任總裁。閻神父1979年晉鐸，曾服務多個堂區。其後，他前往羅馬進修。2006年回港後，在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工作。2008年，他應邀加入香港明愛，擔任副總裁。2015年1月1日，接替榮升輔理主教的楊鳴章主教，任香港明愛總裁兼教育服務部部長至今。

閻神父當年在青衣聖多默宗徒堂服務，有一天收到陳日君樞機主教的電話，邀請他到堅道會面。陳樞機指明愛總裁楊鳴章神父希望教區安排多一位神父到明愛分擔工作。閻神父憶述，他當時只知道明愛是教區的社會服務機構，作為堂區神父，他曾參與明愛賣物會和慈善獎券義賣工作，但自己既非社工、亦非教育專業人士或醫護人員，而明愛的工作更與他原來的堂區牧民風馬牛不相及。因此，當時陳樞機建議他先與楊神父詳談。與楊神父會面時，他提出了「試工」三個月的條件，若三個月過後，雙方都認為適合在明愛繼續服務，他便留下，否則就返回堂區工作。最終，閻神父一直留在明愛，並在楊神父獲任命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時，接替總裁的職務。

閻神父與楊主教相識多年，兩人是修院的同學。當時入讀修院需要先修三年哲學，楊主教天資敏悟，用了兩年時間便修畢課程，所以他較同班同學早一年晉鐸。閻神父憶述與楊主教在明愛共事期間，楊主教十分勤力，做事考慮周詳，並對明愛的大小事均瞭如指掌。此外，每當楊主教聽取匯報時，其實一邊在聽，一邊在思考，待同事匯報完畢後，他已經可以提出問題或提供指導和解決方案。



閻德龍神父向明愛中學學生說故事



閻德龍神父於第四屆明愛中學聯校創藝展中致辭

除了處事精明外，楊主教亦是一位充滿愛心的人。閻神父指楊主教考慮事情時以愛為先，經常接納和包容同事的缺失和不足。他認為正正是楊主教的聰敏和慈悲，令他獲得天主的恩寵，成為香港教區主教。

當楊主教請閻神父兼任明愛教育服務部部長時，閻神父直言當時他對明愛辦學校感到很奇怪，因為教區早已有不少不同類型的學校，不明白作為社會服務機構的明愛為何也辦教育。後來，閻神父從服務的過程中找到了答案。明愛的學校與其他教區辦的學校不同，明愛服務的本質是幫助社會上失落、卑微和無依無靠的一群，即「3L」人士（The Last, The Least, The Lost），例如明愛辦的職業先修學校，為一些學科成績可能不是那麼出眾，或對傳統學科不大感興趣的學生，提供令他們感興趣的課程，培養他們的謀生能力，並藉着教育薰陶他們的心靈。又如明愛的特殊教育，主力服務中度至嚴重智障學童，雖然挑戰很大，卻是其他辦學團體較少服務的群體。透過明愛的特殊教育，可以讓學生建立信心，能夠自立和發揮獨特的才幹，貢獻社會。面對未來教育的改變和新挑戰，閻神父認為明愛教育服務要堅持初心，做好把關，使弱勢社群得到適切的幫助。

作為明愛總裁，閻神父認為未來明愛在面對社會的改變時，最重要是發揮對人的愛心。透過培養同工和義工之間的協作精神，以及對明愛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用社會給予的資源，在主的愛內讓大家開心服務，進一步發揮樂於助人的精神。



陳秀嫻博士

陳秀嫻博士，香港明愛前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2003年退休。她在加拿大完成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後，回流香港工作。她在實習期間曾在加拿大渥太華的保護兒童機構、精神復康和家庭服務實習，而她最感興趣的是家庭服務。1969年，陳博士便加入香港明愛的前身——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為家庭服務工作。

陳博士憶述，整個福利會當時只有幾名社工，分別負責九龍明愛服務中心、堅道服務中心、香港仔服務中心及荃灣服務中心。每名社工每月負責近100宗個案，與今天每名社工大概需要負責40至50宗個案相比，其挑戰性和困難可想而知。

陳博士在擔任堅道服務中心主任期間，主要工作之一是協助中國內地來港難民申請移居美國。這項服務由天主教難民服務（Catholic Relief Services）資助福利會營運，由於申請人士眾多，美國駐港總領事亦定期派人到中心為申請人進行面試。香港明愛初期資源匱乏，不像今天獲得政府定期支援。陳博士憶述，當年明愛的資源多數是靠華德中蒙席在海外（特別是德國）募捐而來的。

陳博士認為70年代對於香港社會福利是重要的十年，因為從1971年開始，社會福利署向低收入人士實施公共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前身），並逐步推行公務員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男女同工同酬對福利會亦有影響，因為福利會一直根據政府薪級表向員工支薪，但當時男女之間相同職級、相同年資的薪級點相差三點。福利會實行同工同酬，最初只適用於新聘用的



陳秀嫻博士（左）出席明愛社會工作服務主辦的金禧宴



陳秀嫻博士參與1997年5月11日青馬大橋舉行的公益金百萬行

員工，舊員工則要分三年補回。另外，1971年7月8日，政府通過《婚姻制度改革條例》，大清律例被正式取消，「納妾制」改為不合法，同年10月7日起，在法律上實行一夫一妻制，當時的社會工作服務部需要按家庭的不同需要提供適切的解說和輔導服務。1985年，陳博士與其他同事從家庭服務的經驗中，發現了擴展服務範疇的需要，並向力理得神父建議推行安老服務，包括先導計劃。「當年香港未有設立弱智兒童中心，家長要外出工作，迫於無奈只好把弱能的子女綁在牀上，旁邊擺放食物給他們充饑。我眼見這樣嚴重影響小朋友成長的慘況，就萌生設立弱智兒童中心的想法，並計劃安排社工家訪，教育家長改變他們的思維。這個想法實現後，便慢慢發展成為我們的康復服務。」她表示：「居住環境擠逼，家人容易產生衝突。那時大多數市民的居所附近欠缺公園設施和青年中心。長者和青年人均困在斗室中，爭吵自然增多。同事們眼見情況日益惡化，便漸漸產生建立老人中心的構想。」陳博士指出，不少創新服務初期都是依靠籌款開辦的，海外國家如德國、荷蘭、瑞士、丹麥等，當時都給予明愛很大的支持。後來隨着項目有顯著成效，政府才陸續為這些項目提供恆常資助。

提到印象深刻的服務個案，陳博士說，她在九龍明愛中心服務時，有一位媽媽每星期都帶着一名年幼的女兒來中心找她，後來她知道這位媽媽其實有三個子女，較年長的兩個已因犯罪分別住進男童院和女童院。同事們都知道這位媽媽生活困難，每次會面都會給她們一些糖果和零食。直至陳博士進行家訪，才發現這位媽媽家徒四壁。陳博士立即到附近買了牀鋪和一些生活用品給她。不幸的是，與這位媽媽相依為命的幼女後來在交通意外中喪生，媽媽頓時崩潰。陳博士替亡者籌辦喪禮，記得喪禮場面十分冷清，只有她、神父和這位媽媽陪伴遺體上山。

1985年，陳博士回到加拿大探望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她憶述當時有人力邀已取得博士學位的地留在加拿大出任大學教師，但明愛有近40名中層員工因移民而離職，她作為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急須為機構思考接班問題，加上當地院校只是以「婦女及少數族裔人士比例員工」的規定而聘請她，因此她斷然拒絕。回港後，陳博士繼續在明愛服務了近20年，與機構一同成長和發展。因着明愛的管理層願意嘗試新計劃，又樂意接納她和其他同事的意見，令他們感到受尊重，所以陳博士一直服務至2003年有接班人繼任後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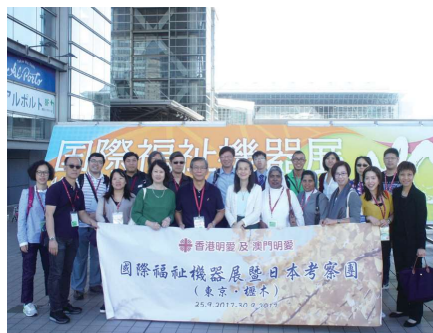
陳美潔女士

陳美潔女士，香港明愛前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2019年退休。1980年，陳女士大學畢業後，如同其他大學生一樣，需要尋找工作。她是社工系畢業，因着機遇便到明愛面試，並成功獲聘。加入明愛後，她深感明愛的目標和宗旨都與社工的服務理念相近，加上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多年來同事們的互相提點，使她能一直在工作和學習中成長，因此留在明愛服務，直至退休。

80年代初，香港仍有不少七層高的徙置大廈，這些建於50、60年代的大廈環境惡劣，居民需要共用浴室和洗手間，針對婦女的罪行時有發生。政府自70年代起，便開始逐步清拆徙置大廈，並將居民安置在設計較佳的公共屋邨單位。陳女士加入明愛後，首個崗位是服務東頭邨徙置大廈的居民，本着「關愛同行」的理念，她嘗試讓居民了解自己的權利，包括得到及時的拆遷資訊，並協助居民與房屋署商討拆遷安排。後來，陳女士先後做過堅道明愛服務中心主任和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總主任，最後晉升為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

作為資深的社工和管理層，陳女士認為工作時如何維持同事的信心和士氣，對服務的成敗起着關鍵的作用。陳女士提到當她擔任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總主任時，因香港經濟環境轉差，政府要求各資助機構重整架構和合併部分服務。明愛的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亦需要把原有的青年中心、外展隊等整合成新的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陳女士回憶，當時不少同事都心感不安，有些人願慮合併後會遭到裁員，有些人擔心工作重新分配後會應接不暇，更有些人擔憂取消外展隊會令青少年得不到適切的服務，長遠影響青少年服務的質素。在得悉同事的憂慮後，陳女士便向管理層反映，最終透過內部資源調配，成功將外展隊保留下來。

明愛的服務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那麼社會工作服務部如何確保在日常的服務中實踐出來？陳女士說她加入時，明愛的員工不算很多，當時機構每年都會安排退省營，邀請神父分享服務理念，讓同事認識要成為受眾的同行者。令她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次，是由時任總裁的力理得神父分



陳美潔女士（第一排左五）參與國際福祉機器展暨日本考察團

享，他說：「有人的需要，就有明愛的服務。」令她深受感動。到了楊鳴章神父擔任總裁時（2003年，楊神父獲委任為明愛總裁，直至2014年榮升輔理主教方才卸任），明愛的服務已大幅擴展，同事數目亦有相當程度的增長，而每一個部門每年都會一如既往，安排退省營給同事，但總裁仍是一一出席，向同事分享服務精神。明愛除了着重對員工的專業培訓，更重視將價值觀傳承下去。楊神父更定下了「扶助弱勢社群 發展人的才能 致力溝通和解 建立回饋精神」的服務使命，讓資深員工向新入職和現職同事講解。至今，明愛的服務更加多元化，社會工作服務部仍從部門、服務、單位三個層面教導員工認識和實踐明愛的使命。

提到對楊主教的印象，陳女士認為他是一位有威嚴的智者。她每次把工作的事情向楊主教請益，他總會充滿智慧地分享他的見解，啟發她去尋找答案。楊主教又十分關心同事的發展和成長，強調「先學做人，再學做事」，並鼓勵同事要有「專業以外」的理念，為服務使用者多行一步，亦要多關心和發展自己專業範疇以外的知識，並反思自身的不足。

陳女士又提到，在明愛工作的好處是自由度很大，管理層十分包容和願意接納同事的意見，例如明愛不少的創新服務和先導計劃，就是前線同事在工作過程中，觀察到服務成效的不足，或服務未能到位，向機構反映，然後構思出新的計劃來。可見明愛的同事都明白以服務弱勢社群為依歸的工作原則。

隨着社會和時代轉變，社會工作服務部的服務不斷與時並進，推陳出新，例如2000年前後，因經濟情況惡化衍生出各種家庭問題，明愛成立了向晴軒，為身處危機的個人和家庭提供輔導、危機支援熱線，以及短暫住宿服務。後來又因應各種社會問題開創多元化的新服務，例如應對青年濫藥問題的明愛容圃中心、應對賭博問題的明愛展晴中心，以及為護老者提供支援的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等。

談及擔任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期間的難忘事情，陳女士說其中之一是籌募重建明愛荃灣服務中心的經費。當時，明愛雖然已獲得香港賽馬會捐助大部分重建經費，但仍要籌募不足的1,000多萬元；而明愛除了重建項目外，更有楊主教在本港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大學的偉大願景，要為明愛專上學院籌款興建位於將軍澳的新校舍。兩個項目幾乎是同時進行募捐，難度相當大。陳女士很感恩得到主教的支持，以及社區人士對明愛服務的認同，最終得到不少服務使用者、堂區教友、社會人士，以及商業機構的踴躍捐助，令兩個項目都順利完成。



黎永開先生

黎永開先生，香港明愛前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2022年9月退休。

1982年，黎先生大學畢業，剛巧有一位明愛的前輩在香港中文大學派發職位申請表，他念大學時曾在大埔臨時房屋區實習，於是便申請社區發展服務工作。入職後，當年的社區發展服務總監安排他到西貢上班。他那時住在筲箕灣，需要轉乘幾次船和車才能到達工作地點，便向總監表示有困難，總監於是安排了九龍灣臨時房屋區的崗位給他，辦公室位於牛頭角服務中心。他到任後，發現服務隊已有三名社工和一名文員，後來他才知道原來有一位同事即將移民，而他正是接替他的職位，慶幸當時有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讓他充分掌握工作的內容和要求。

當時，政府為了安置大批難民，容許他們在未開發的地區搭建鐵皮屋，但這些臨時房屋區配套不足，設施、衛生、治安均存在着隱患。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就在這些地區協助居民共同解決問題，例如居民生病時很難找到醫生，明愛社工便協助尋找醫療機構，安排醫生定期到診。黎先生協助九龍灣臨時房屋區的居民成立居民委員會，第二年，主席林澤飄競選市政局議員，黎先生協助競選，最後林先生順利當選，是全港首位當選市政局議員的車衣工人。林先生當選後，馬上面對一個難題，就是當年的市政局開會文件全是英文書寫。黎先生初時協助他翻譯，後來建議他向市政局爭取聘請一名秘書，終於解決了開會的問題。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件，是當年政府計劃取締臨時房屋，並逐步讓合格的居民搬進公屋。



黎永開先生於兩岸四地勞動關係論壇發表演講



黎永開先生（左一）出席明愛社會工作服務舉辦的「明愛商界伙伴同行」嘉許禮

當年的房屋政策以家庭為優先，單身人士則要面對臨時房屋被拆，無家可歸的情況。因此，不少住在九龍灣臨時房屋區的單身居民感到極為苦惱。黎先生於是建議他們可以採用和平的示威方式，讓社會和政府了解他們的訴求。當時，他們想出了「單身亦係人，為何被犧牲」的口號，由黎先生寫在橫額上。後來，部分居民決定到政府總部露宿抗議，黎先生和其他同工輪流前往陪伴和開解。雖然抗議活動沒有成功，卻促使了政府檢討單身人士的房屋政策。

2003年，淘大花園爆發「沙士」疫情。黎先生時任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總主任，工作包括管理明愛轄下各個社區中心。疫症期間，鄰近淘大花園的明愛牛頭角服務中心肩負支援居民的工作。黎先生憶述當年明愛的同工不顧自身的安全，面對未知的疫症，自願運送物資到淘大花園支援遭隔離的居民，這正顯示了明愛總是在最適當的時間，在最有需要支援的地方，提供適切的服務，以彰顯關愛精神。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夫人在牛頭角中心的禮堂，向傳媒朋友說出「洗手、洗手、洗手」的名句，而這一幕成為了港人對這場疫症的重要記憶。

2020年，對黎先生而言是難忘的一年。這年本港發生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市民人心惶惶，爭相搶購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資。時任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的黎先生，向總裁閻德龍神父爭取特別批准，直接向供應商採購口罩。黎先生記得當時是大年初二，得到閻神父批准後，他馬上向馬來西亞的廠商訂購口罩。「閻神父敢在非常時期做非常決定，令同事及時得到需要的保護裝備，安心工作。其後，神父更與我們一同到院舍為前線員工打氣。」



麥錦秋先生

麥錦秋先生（藝名麥秋），是執導超過100齣舞台劇的資深戲劇家。他在1956年領洗，翌年便開始在聖德肋撒堂服務。當時聖德肋撒堂堂區範圍內的寮屋區居民多是由內地來港的難民，言語不通，加上文化和生活習慣和港人不同，天主教會既急需向他們提供教育和培訓，而區內青年又缺乏活動場所，總之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麥秋認為雖然區內已有多個機構的福利員為難民提供服務，但這些服務的目的主要集中在提供生存所需，較少考慮他們的個人發展，所以當時麥秋便想透過遊戲的方法，為青年人提供服務。由於他曾在清華書院跟從柳存仁、熊式一等大師學習中國、歐洲戲劇史和表演技巧，因此便從戲劇入手去教導年青人。

1968年，麥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加入了明愛。當時一名聖德肋撒堂的修女推薦麥秋上傳道員課程，上課地點正是明愛大廈。成為了合格傳道員的麥秋，選擇留在堅道的社區中心擔任青年工作者。他指出當年的社區中心和青年服務機構多位於徙置區，只有明愛在堅道開辦服務點。他認為這與時任明愛總裁的力理得神父不無關係，因為力神父看出較富裕的青年人亦需要社區中心，作為聚會的地點。麥秋還記得當時使用中心的青年多來自附近的學校，如聖若瑟書院、聖心書院等。

後來麥秋成為了中心主任，在力神父的支持下推出了多項嶄新的服務，為弱勢社群帶來希望。他留意到通往堅道的隧道經常有盲人賣唱，又有傷殘人士販賣手工藝品，他靈機一觸便想到為何不向他們提供機會呢？他得到力神父同意後，利用堅道中心舉辦「明愛藝術節」和開設傷殘青年中心。先說「明愛藝術節」，當時麥秋和中心其他員工到各區找來街頭賣藝者、樂步社、一畫書、天一業餘劇社等參與藝術節，但沒有足夠的經費，幸得當時中區民政事務主任梁寶榮先生協助，才找到贊助人。至於開辦傷殘青年中心，挑戰更大。不少同事對這項服務都大力反對，理由是明愛的員工沒有照顧傷殘人士的經驗，未受過相關培訓，又沒有方法運送他們到堅道。雖然持反對意見的人很多，但麥秋沒有放棄。有一次，他留意到附近的美利兵房有人在洗軍車，便聯想到不



麥秋先生（右）參與機構舉辦的康復工作職員進修研討會（80年代）

少軍人在戰爭期間受傷，成了傷殘人士，所以軍人應該有照顧傷殘人士的經驗。麥秋向力神父提出這個大膽的想法後，力神父馬上致函軍營的指揮官，希望他們分享照顧傷殘人士的經驗。指揮官竟然立即答應了，不但派軍人來分享經驗，之後更派軍車運送傷殘人士往返堅道中心。考慮到傷殘人士自力更生的需要，這家傷殘青年中心自發引入了中文打字機，並創立了中文打字社。後來的傷殘青年協會和傷殘青年樂團便是由堅道明愛中心發展出來的。

1972年，麥秋被派往九龍的明愛中心繼續服務。1974年，麥秋調任明愛樂協會主任。明愛樂協會當時與監獄署合作，推行戒毒康復工作，讓有毒癮的釋囚到樂協會接受監管和培訓，希望他們能脫離毒海，自食其力。麥秋到樂協會前，已知這是艱鉅的工作，他說：「當時社會風氣普遍不接納戒毒者，社會壓力令他們很快走回頭路；上兩任的主任均感到工作成就感不足，做了不到半年便離開。」麥秋一做便做了七年，但他從沒有交出「亮麗的成績表」。「當時監獄署和政府都要我每年交成功個案的數字，我說是零。我沒有說謊，力神父和國際明愛也認同這個事實。許多康復者只是脫離了毒癮兩、三個星期，因為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又再去吸毒或突然不再出現在樂協會。由於家人對他們不信任，例如他們如廁的時間稍長，家人就懷疑他們，責罵他們再次接觸毒品，甚至把他們逐出家門。所以，如果要我每星期交出成功個案，我是有數可交的，但按年計就真是零。」七年來，麥秋每天為康復者提供輔導，尋找工作，陪他們見工，讓他們有機會重投社會。他坦言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明愛工作期間，麥秋仍繼續戲劇的夢想。他在堅道工作時創辦了「天一業餘劇社」，邀請年青人學習演戲，當時麥當雄亦有演過他的戲。基於種種原因，麥秋最終在1982年選擇以另一種方式服務明愛。那時市政局邀請麥秋擔任四個劇團的藝術總監，他與力神父商議後，決定接受邀請，但同時承諾協助訓練兩位社工接手樂協會在香港和九龍的兩間服務中心，並擔任主任職務，而他則以義工身份繼續為明愛和教會服務。

直至近年，麥秋仍透過戲劇侍奉天主。他到監獄探訪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教他們演戲，從戲劇中領悟人生。「他們當中不少人一生都沒有做過好丈夫、好父親和好兒子，但在戲劇裏面，他們可以重新做一次人，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和好兒子。甚至有些懲教署的職員都受我感動，讓這班在囚人士可以有多些機會在獄中演出，甚至自編、自導、自作曲，排練戲劇娛樂嘉賓，並在每年一度的懲教署在囚人士畢業典禮上演出。」

戲劇造就了麥秋，麥秋也用戲劇造就了別人。



李崇德先生

李崇德先生，香港明愛前教育服務部部長，2010年退休。

1967年，李先生加入香港天主教福利會，擔任香港仔服務中心附屬的職業訓練學校主任。他創辦了明愛的職業訓練教育，前後建立了十間職業先修學校。他在明愛一共服務了43年，貢獻良多。

在加入明愛以前，李崇德先生是一名天主教中學的英文教師，同時在石硤尾聖方濟各堂擔任輔祭。1967年，聖方濟各堂的郭樂賢神父（Rev. John Collins, S.J.）調任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的香港仔服務中心，擔任中心主任。到任後，郭神父得悉中心設有職業訓練學校，就邀請李先生擔任學校的主任。當時，香港仔中心的職業訓練學校分為男、女兩所學校，女校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修女管理，男校則由李先生管理。

李先生到任後，發現該「學校」只是一所提供訓練課程的中心，尚未正式註冊，所以他馬上向當局申請註冊。由於那時香港仔有眾多漁民，學校的學生主要是漁民子弟。學校為他們提供機械、電工維修等課程，讓他們認識如何為漁船進行基本的維修。李先生因應漁民的作業模式，在課程設計上盡量遷就，例如漁船每次回到香港仔，只會停泊一、兩個月，便要出海三、四個月再回來，故此上課要配合學生的時間，並要為他們補課。

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暴動平息後，政府從多方面分析事件的原因。當時就學率較低被指是原因之一，因為當年只有約50%的適齡人口有機會升讀中學，而學生在小學畢業後又未到最低就業年齡，結果便成為街童。當時，獲邀提供建議的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應將原來一年制的職業訓練課程延長至三年制，讓適齡人口有機會接受謀生技能的培訓。政府接納了建議，制定職業先修學校的新政策。職業先修學校是三年制，有一半時間讓學生修讀中文、英文和數學等文法科目，另一半時間則修讀兩至三科職業科目，例如男生修讀電機、機械、木工、印刷，而女生則修讀打字、縫紉等，畢業後便成為合格的半熟練工人。政府找了三個辦學團體負責試辦，包括天主教會、聖公會和中華基督教會，徐誠斌主教便指示福利會承擔這項任務。由於福利會之前



李崇德先生（左）在明愛教育服務部舉辦的教職員進修日致送感謝狀予講者

已於堅道中心和香港仔中心開辦職業訓練課程，兩間職業訓練學校隨即成為本港首批職業先修學校，並在1969至1973年間參與政府的試驗計劃。因為職業先修學校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包括家長和學生，所以最終成為了常規課程，而所有職業先修學校亦成為全額津貼中學。

由於職業先修學校的大部分畢業生只有15歲，雖然可以合法工作，但始終屬於未成年人，有不少受僱的限制。到了1976年，政府參考德國的類似法例和培訓計劃，制定《學徒訓練條例》及培訓計劃，規定一間工廠或工業企業在聘請18歲以下工人時，需要為他們提供「學徒訓練計劃」（正式名稱為「部分時間給假課程」Part-time Day Release Program）。這項計劃規定學徒大部分時間在公司工作，但同時須到職業訓練局屬下的工業學院進修理論課程。當時，一些與政府合作的企業，便安排學徒到工業學院每星期上課一個全日和兩節晚間課程。完成整個學徒訓練後，學徒便成為合格技工，並獲得政府發給牌照。不少參與計劃的大企業，例如香港電燈、中華巴士和九龍巴士都樂意與政府合作，並承諾聘用訓練畢業生。

隨着社會對職業先修學校的學額有持續的需求，明愛在70年代獲得已故會德豐主席馬登先生捐款，加上政府的撥款，營辦了三間分別位於屯門、沙田和柴灣的馬登基金職業先修學校。明愛在各區陸續建立職業先修學校，一度同時營辦十間學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府將文法中學改為五年制，但職業先修學校仍維持三年制課程。早在1978年，明愛為了照顧一些不想在中三畢業後立即就業或參與學徒訓練計劃的學生，已將部分三年制課程擴大為五年制，與文法中學相同。其後，政府亦採用了類似的政策。

80年代後期，香港的製造業漸次北移，對技術工人的需求減少，加上多數家長期望子女在完成中五後繼續升學，於是自90年代開始，社會對職業訓練學校的需求便持續下跌。雖然明愛的職業訓練學校曾開辦中七課程，其後又配合中學文憑試設立中六課程，但社會風氣還是普遍較重視公開考試成績，特別是傳統文法學科的成績，導致職業訓練學校面對收生困難。在這個趨勢之下，明愛的一些職業訓練學校便因為資源或收生問題而停辦。

談到難忘的經驗，李先生說，必定是自己初到明愛職業訓練服務時，因為對電工、木工、金工、印刷等科目一竅不通，卻被任命為負責人，只能硬着頭皮尋求協助和不斷學習。幸得當時香港仔工業學校襄助，他才知道每個職業課程需要採購甚麼器材、聘請甚麼老師。後來，李先生有機會到意大利進修，學習如何設計和管理職業訓練課程。就是這樣透過不斷學習，越做越好，在任期間創辦了十間學校，不經不覺服務了明愛43年。他認為這一切，都有賴天主的祝福。



朱鄧麗娟女士

朱鄧麗娟女士，香港明愛第四任扶幼服務和學前教育服務協調總監，2004年退休。1962年，香港天主教福利會在荃灣設立首間社會服務中心，當時稱為「天主教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同年，朱太加入明愛，就在荃灣社會服務中心附設的幼兒園工作。朱太在荃灣幼兒園服務了數年，其後分配到明愛屬下的其他幼兒園和幼稚園工作。1980年，朱太出任扶幼服務和學前教育服務協調總監，服務至2003年。朱太在明愛悠悠數十載，展現的就是明愛精神。



朱鄧麗娟女士視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為另一個家

朱太特別記得早年在荃灣幼兒園服務時，很多幼兒都是住在附近的徙置區和山上的寮屋區，家境清貧。朱太在探訪家庭時，遇有經濟困難的家庭，便主動為他們的子女申請減免學費。當時每月學費雖然只是十餘元，但仍有不少家庭無力支付。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到徙置大廈進行家訪，走進一個面積大概120呎的單位，室內只有一張帆布牀、一個火水爐和簡陋的炊具，學生的父親就躺在帆布牀上。原來他在建築地盤工作，經常接觸石棉，因而引致肺積水，無法工作；家中還有一名襁褓中的嬰兒。他們一家生活困難，母親唯有到附近山頭的墳場，做一種稱為「山狗」的工作，替人清理墳頭、墓碑等，賺取一點點的生活費。朱太與同事看到此情此景，深深體會到貧困無助的苦況，不由得淚盈於眶，並立時批出學費減免。她指出這正正是香港明愛服務的一大特色：為弱勢人士提供即時支援，締造希望。雖然明愛初期經費並不寬裕，但必會將服務對象的需要放在首位。

1966年，朱太轉到香港仔聖高弗烈幼兒園工作，認識了幼兒園主任法蘭根女士（Gertrude Frenken）——首任扶幼服務協調總監。她憶述德國籍的法蘭根女士引入德國育兒概念和多元化玩具，從意大利引入蒙特梭利教學法，以及從歐洲採購了不少教學玩具，還親自為她講解每件玩具背後的理念和教育意義。當朱太踏入聖高弗烈幼兒園，便對園內的歐陸式陳設甚感興趣。當年幼兒園的學童多來自艇戶，更有不少學童身上長滿癩瘡，但法蘭根女士毫不介意，會抱起他們。

朱太為這一幕幕的情景深深感動。1967年，她受任為聖高弗烈幼兒園主任（單位主管）。

明愛幼兒教育的特色是重視兒童的自然成長，按部就班，配合年齡學習合適的技能和知識。朱太認為讓孩子在生活中實踐愛，學習尊重自己和別人，敬愛長輩，即使簡單如打招呼稱早、離開座位時放好椅子、懂得收拾自己用過的物件、與他人分享等等，都須從幼小開始培育。幼稚園老師會鼓勵幼兒分享，小朋友都會將家中的食物、玩具帶回學校和其他幼兒一起吃，一起玩。朱太還記得鄰近北區邊界的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早年有不少學童都是農民子弟，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將家中初生的小豬帶回學校，同學們都很興奮，爭相餵飼，但是無論如何，小豬都不肯進食。到了第二天，小朋友的家長來到學校向幼兒解釋小豬只會吃豬媽媽的奶，同時也向幼兒分享了一些養豬的知識。朱太認為這就是讓幼兒從生活中學習的好處，不僅增添了幼兒的知識，也從過程中讓幼兒學習分享和建立同伴間的情誼。

「不要強我所難，不要加我重擔；給我適當自由，我要開心且且。」這是朱太寫給孩子的兒歌，也道出了明愛幼兒教育的特色——尊重每一位幼兒的獨特性。朱太說明愛沒有採用艱深的課程，初期收生比較困難，但隨着開放課堂給家長到幼稚園觀課和討論，讓家長看到明愛幼稚園活動教學法的特色和對兒童成長的好處，知道明愛的課程是着重幼兒從生活中學習尊重、學習愛，於是家長便逐漸喜愛和支持這種培育孩子的理念。

扶幼及學前教育服務在過往的成長道上，總會回應社會的需要，開創或拓展服務。朱太舉例說，在80年代初，當她往歐美參加國際研討會時，參觀了當地的玩具圖書館後，便在幼稚園引入西方遊戲課室的設計，同時拓展資料室「親子軒」（後更名為「親子玩具圖書園地」），加強家長教育，倡導正確的幼兒學習模式。朱太因為對幼兒教育有卓越的學識和見解，所以在80至90年代，曾參與政府不同層面的諮詢委員會，建議適切的幼兒政策，為幼兒謀福祉。

朱太指出明愛的特色之一，是團隊合作和同事之間互相支持，她說在多年的服務過程中，難免遇上種種的挑戰，例如處理各種投訴和危機，她引述已故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的訓勉：「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服務。」就是這句說話堅定了明愛同事服務受眾的信心。朱太借用明愛七十周年的口號「關愛同行七十載 燃亮希望照未來」送給所有明愛同僚，作為互相砥礪的勉語。



胡錦遠博士

胡錦遠博士，香港明愛教育服務部副部長。胡博士曾在本港一所天主教學校服務近 20 年，其後轉到大學講課和研究。後來，澳門教區主教邀請他到澳門一間中學擔任校長，並在學校推行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課程。2020 年，接受香港明愛總裁閻德龍神父邀請，加入香港明愛，擔任教育服務部副部長。

胡博士到任後，首要的兩大工作是確立明愛教育的宗旨和推行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他認為教育服務部的服務宗旨是本着基督精神和天主教倫理道德價值，秉持香港明愛教育服務「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的信念，履行「扶助弱勢社群 發展人的才能 致力溝通和解 建立回饋精神」的使命，提供以終身學習、綜合全人教育和公平機會為基礎的優質教育。明愛教育服務讓我們的學生，縱使有些來自社會上最末後無靠 (The Last)、最卑微無助 (The Least) 及最失落無救 (The Lost) 的一群，轉化成充滿愛心 (Loving)、主動學習 (Learning) 及具備領導才能 (Leading) 的人，一展所長，貢獻社會。

本港近年適齡學童人數減少，形成「結構性問題」，預計未來十年情況會日趨嚴重，令明愛學校招收學生的情況日益嚴峻。但是，胡博士認為明愛教育以「愛」為先，能真正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又能培養學生的品格，有助他們在社會上立足，故有其特色和吸引力。

胡博士指出明愛教育近年推行「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以及推出「職業專才計劃」的



胡錦遠博士十分認同明愛的教育宗旨



胡錦遠博士 (左) 出席明愛職業專才教育計劃啟航禮

「一條龍升學階梯」，將是明愛教育發展的新方向。「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美德 (Virtue)。美德是需要透過各個品格 (Character Strength) 在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所以品格可理解為達致美德的過程和機制。品格是恆常存在的、令人感到滿足的、有道德價值和獨特的。胡博士強調品格的內涵除了展現於行為表現，亦會反映在學生的想法和情感上。換言之，道德教育可理解為一個培養和協助學生發掘不同品格優點的過程。

至於「職業專才計劃」，胡博士表示明愛十多年前開始停辦職業先修學校，但是隨着政府政策的改變和社會的需要，明愛決定重振職業教育，推出富明愛特色的「職業專才計劃」，讓學生掌握職業技能，畢業後有一技傍身。胡博士解釋這「職業專才計劃」簡稱「VPM 計劃」，除了職業 (Vocational)、專業 (Professional) 外，更加入了道德感 (Moral)。道德感融合了「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的元素，目的是為社會培育具有工作道德的職業專才。

胡博士深信明愛教育的優勢是有「一條龍升學階梯」，包括中學、社區書院、白英奇專業學校和明愛專上學院。學生中學畢業後，若成績較好，可直接升讀白英奇專業學校和明愛專上學院；成績較遜者，可以先入讀明愛社區書院課程。白英奇專業學校和明愛專上學院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升格為聖方濟各大學，這樣就構成無縫銜接的「一條龍升學階梯」，為社會培養更多職業專才。胡博士總結說：「若學生想繼續升學，明愛教育就讓他們繼續升學；若學生想先投身社會，將來亦可隨時選擇返回明愛繼續進修，這亦會是明愛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



麥建華博士

麥建華博士，明愛專上學院和白英奇專業學校校長（2017年至今），加入明愛前是香港賽馬會公司事務總監。在賽馬會工作期間，麥校長曾在多個部門工作，負責不少與學校教育相關的事務。

麥建華校長認為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日後加入明愛有莫大的關係。「年青時社會環境困難，我十分幸運，在不同的階段都獲得獎學金，可以繼續升學。在獲取獎學金的同時，我從捐助人身上學習了回饋社會的精神。完成博士課程後，我曾經想過在大學任教，但際遇促使我投身專業發展。」後來，麥博士因工作關係接觸到學校發展，「我許多工作和服務都與中學、大學有關。四川發生大地震，我更直接參與國內重建學校和招聘的工作，這工作持續了十多年。後來，我又加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服務。因為我知道明愛的辦學宗旨很有意義，所以當明愛邀請我加入發展高等教育時，我就接受了。」

說到高等教育，麥校長指出，過去一直是精英教育，但目前的大趨勢是普及教育。隨着社會趨向智慧型發展，科技和社會發展也日新月異。一個學位已經不足夠，學生需要不斷去吸收新的知識。他認為專上教育應該為各個人生階段的人士提供服務，讓大家都有進修的渠道。

因應高等教育的新發展，麥校長談到明愛專上學院的特色。他指出明專重視全人教育，同時重視畢業生的出路，因此明專在課程設計和爭取商界的認同方面十分着力，特別是獲取專業資格和認證，必定盡量讓畢業生的資格與其他本地大學看齊。在回應社會的需求方面，明專特別重視提供社會上需求較大的專門人才培訓，例如明專設立了全港最大型的註冊護士課程和物理治療課程，為本港培育更多相關專業人才。

明專近年推出的「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等課程，內容都涉及近年熱議的元宇宙和創新科技，為學生提供新穎和切合時代需要的知識。另外，「翻譯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教導學生善用科技的協助，透過人工智能輔助，讓學生體驗翻譯



麥建華博士積極在專上教育的範疇上推行職專教育

多達數百種語言，甚至圖像翻譯。明專亦透過與國內和本地的企業合作，開辦「企業管治碩士（兼讀制）」，以回應社會和商界的需求。

作為明愛教育服務的成員，明專亦致力培育學生的品德，並希望學生能夠「主動學習、以愛心服務及成為僕人的領袖」。學校鼓勵畢業生善用智慧和能力，用心地工作和服務社會。不同才能的學生都可追求不同方面的卓越，在不同領域發光發熱。

至於明專未來的定位，肯定是申請升格為聖方濟各大學。麥校長指出明專自創校發展至今，一直以大學的規格，用心辦學，服務和培育學生。若日後成功升格成大學，除了更換校外名，更希望能發展多一些社會急需，但不能單靠公營學位滿足需求的課程，以配合政府以公營及自資教育界別並行發展的方向。這樣便能與公營界別相輔相成，共贏互利。透過發展更多應用的專業課程，可以發揮明愛獨特的一條龍升學階梯，讓有志的青年能夠成就個人所長，貢獻社會。

談及近年明專的重要發展，麥校長認為首先是目前明專擁有很好的校舍，能讓學生在最好的環境下學習，包括配備各種業界先進的器材和設備，使學生有機會接觸最新的科技和服務標準。這有賴各界的慷慨捐助，實在銘感五內。其次是近年學校因疫情需要轉用線上學習模式，卻為學校提供機會發展新的教學方法，這要感謝教職員的努力，同時更期望明專能善用優越的條件，為本港未來的教育發展作出貢獻。



李惠芳女士

李惠芳女士，前明愛長洲服務中心主任，2000年退休，曾任長洲明愛聖保祿學校校監（1973至2000年）。

李女士自葛量洪師範學院畢業後，執教三年，然後到法國露德進修。回港後，有教友建議她到明愛工作。明愛聘用了李女士，並安排了她到長洲服務，一做便是20多年。

李女士說，她從來沒有想過到營地服務，但原來這是一項十分適合她的安排。因為她是體育老師，明愛安排她負責管理長洲營地的膳食和活動，例如土風舞等等，正好讓她發揮所長。她很高興可以為來自不同學校和背景的小朋友安排活動，以及能在工作中與同工建立良好的關係。明愛的營地服務透過安排種種活動，以及要求營友參與清潔營舍、洗碗等工作，培養他們的生活技能、紀律，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

除了在明愛的長洲營地服務外，李女士亦協助教區和明愛，擔任了多間學校的校監、校董。李女士表示任職最早和任期最長的一間是長洲明愛聖保祿學校，她自1973年起，擔任了近27年的校監。對於未曾擔任過校長的她來說，是一項值得感恩的成就。

在服務以外，李女士亦與長洲的街坊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她記得當時其他同工每每向她說，有一些街坊笑言「李姑娘每次到長洲，都要一個多鐘頭才能由碼頭走到學校」，因為不少街坊見到她都會主動找她傾談。由於她對長洲貢獻良多，政府委任她當了三屆區議員，又頒給她榮譽獎章。到了今天，每逢她回到長洲，不少街坊仍會與她熱烈攀談，可見她與長洲人建立了何等深厚



李惠芳女士對明愛營地服務貢獻良多



李惠芳女士（左二）參與2005年明愛賽馬會愛暉游泳池開幕禮

的友誼。

回憶起前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李女士說，神父幾乎每個星期六都會入長洲「度假」，除了與營地員工共進晚餐，更會與員工一同建設營地，例如種樹、鋪路等等。當年，明暉營仍是一片光禿禿的山頭，現在卻是綠樹成蔭，她認為力神父居功不少。當時不少長洲街坊很好奇，為何有一名外籍人士當花王，但力神父從未解釋。雖然，力神父從未公開表揚過李女士，但原來力神父私下向政府詳述她在長洲所作的貢獻，並給予極高的評價。她後來獲得政府嘉獎，或許是肇因於此。

提到在長洲服務期間印象深刻的事，李女士指長洲營地的口碑很好，除了每年接待為數不少的學生外，更有不少政府高層長途跋涉，坐船、坐直升機到長洲參觀營地，了解他們的服務和設施。有一次，當時的陳日君神父（編者按：2002年獲任命香港教區主教；2006年擢升樞機主教）帶着一群學生來宿營，但天文台預測會打風，所以李女士按規定請他們盡快離開，可是陳神父認為有部分學生來自澳門，到了香港島也沒法回家。李女士於是破例讓他們留下，還一起煮飯。想不到風暴真的來臨，營舍有80多塊玻璃損毀，幸好學生主動協助清理。她本以為讓他們留下來是為他們解困，想不到最後卻是學生幫了自己一個大忙，為此十分感恩。



陳玉麟先生

陳玉麟先生，香港明愛賓館及餐飲服務委員會主席（1993 年至今）。陳先生年輕時便在明愛賣物會擔任義工，持續服務明愛數十年，其後更成為「明愛之友」的創會成員。自公務員生涯退休後，他全力投入明愛的工作，並擔任賓館及餐飲服務委員會主席至今。

陳玉麟先生與明愛的接觸始於 60 年代。他是天主教徒，有一次協助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舉辦聖誕兒童嘉年華時，到明愛位於中區安樂園大廈的青少年中心借用放映機放映卡通片，為區內基層兒童提供康樂活動，因此認識了力理得神父。其後，他被力理得神父邀請出任明愛賣物會司儀，從此便開始在明愛擔任義工。從正職退休後，陳先生更全力投身在明愛服務。他曾在香港仔田灣服務中心擔任長者英語導師，由 26 個英文字母開始，教授長者一些簡單的英語。陳先生記得有一次，邀請一位長者在黑板上用英文寫出自己的名字時，她對陳先生說是自己首次在黑板寫字，感到十分光榮，因為只有老師才有資格在黑板上寫字。這番說話令陳先生十分感動，原來他一個小小的舉動，已經為這位長者學生帶來認同感和尊嚴，而這正正與明愛維護人的尊嚴，給他們締造希望的目標不謀而合。

作為現任賓館及餐飲服務委員會主席，陳先生指出明愛的賓館及餐飲與明愛大部分服務不同，並沒有政府的資助。賓館及餐飲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來港的教會團體和教友，以及在服務點附近的居民和上班人士；服務旨在為他們提供經濟、可負擔的住宿和餐飲服務。從業務中賺取的微薄盈利，會用於支援明愛的其他服務，以照顧弱勢社群，給予他們關愛和希望。

談到近年賓館及餐飲服務的情況，陳先生直言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整個酒店業和餐飲業帶來衝擊，直接影響使用率，而明愛的餐飲服務更曾因疫情而關閉。雖然遇到逆境，但是賓館及餐飲服務的員工各出其謀，提出種種的建議，改善經營狀況，例如因疫情關係，部分市民遷出原來的居所，需要另覓可以長期租住的地方，明愛賓館因此提供長期租住優惠吸引他們；又有市民



陳玉麟先生積極投入於明愛餐飲服務的發展

在裝修居所時，需要另外租住地方，明愛的賓館和宿舍就推出優惠，讓有需要的市民以優惠價錢短期入住；餐飲服務提供兩飯、三飯，同時推出「買幾送幾」的優惠，增加服務的使用率，讓業務能夠維持正常運作。在疫情期間，發生了一件讓他深受感動的事情。一些教友知道疫情令不少基層家庭生計受到影響，便主動找明愛的餐飲服務幫助。他們願意捐出一筆金錢，委託餐飲服務購買各種食材，再製成食物包，分發給有需要的家庭。這樣正正體現香港明愛為最需要的人服務的宗旨。

提到服務明愛數十年，會否考慮休息？陳先生回答說，十分感恩自己走過的路：「天主給我多少日子，我就做多少天。」



黃鑾堅先生

黃鑾堅先生，香港明愛前社區及接待服務總監，2010年退休。黃先生於70年代初加入香港明愛，在社區發展服務工作，被安排在西貢明愛漁民村服務。其後，又分別擔任過沙田明愛服務中心助理主任、社區及接待服務總監等職務，服務明愛38年。

黃鑾堅先生在明愛工作的首十年，在西貢工作，當時漁民多住在「住家艇」上。「住家艇」不能隨意離開定錨的地方，不少漁民只能靠在岸上打散工或到別人的漁船上當漁工，賺取微薄的收入。明愛的前身「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眼見漁民的困境，所以於1967年西貢對面海建成了明愛伯多祿村，是明愛第一條漁民村，其後又於附近建立了太平村和明順村，這三條村共住了200多戶漁民。村內的設施不斷改善，由最初只有簡陋的房屋，需要共用廁所和廚房，發展至每間屋都有獨立的廁所和廚房，村內更建立了禮堂，讓村民有聚會的地方。

黃先生在西貢的漁民村工作了十年，他憶述當時的工作是組織漁民，提供指導，讓他們有能力自己管理村落。同時，明愛的員工教他們認字，因為「漁民村定期開會，需要會議紀錄。明愛同事列席會議，當村民不懂某些字時，他們會寫給村民看，教他們認字，然後由村民親手寫進紀錄裏。」

在服務西貢期間，黃先生獲得明愛安排到國外進修。1982年，黃先生被調派到新發展的沙田新市鎮服務，擔任明愛沙田服務中心助理中心主任。「當時明愛沙田中心內設有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幼兒服務、青少年服務和老人服務等等。中心主任的角色是協調中心內不同的部門，為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我因此有機會了解明愛不同部門的運作，接觸區內不同的人士和機構。」當時，沙田是發展中的社區，各種設施仍在興建，所以明愛沙田服務中心和鄰近的教區學校，便成了政府舉辦區內大型活動的場地，例如沙田文藝節、沙田節等等，都曾在中心內舉行。其時，



黃鑾堅先生感恩自己能在明愛服務38年

黃先生亦開始為明愛的成人教育學校、中學、幼稚園擔任校監、校董。

黃先生在擔任助理中心主任期間，開始參與公共服務，獲邀加入沙田區議會和其他委員會。到了90年代初，醫院管理局成立後，他被局方邀請為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成員。他當時表示在不影響機構工作的前提下，樂意接受邀請。後來，明愛亦委任他擔任明愛醫院管理委員會委員。他強調參與公共服務，不單是投身政治，更是因為「明愛是一個服務機構，我參與委員會是以服務社會為目的」。意想不到的是，黃先生透過參與不同的委員會，對不同政府部門的架構、職能、運作有了更深的認識，有助他在明愛的工作。「例如舉行明愛賣物會，每個攤位都要符合一些安全標準；又如電動遊樂車需要通過機電工程署審批。因為我認識政府的架構，知道申請不同的審批應該找哪一個部門，這樣便減省了時間，亦令工作更順利。」

到了90年代，黃先生被委派新的任務，轉往社區及接待服務工作，並晉升為社區及接待服務總監，直至退休。黃先生指出當時的社區及接待服務包括了今天的餐飲、賓館和宿舍等服務。與他先前做過的服務不同，社區及接待服務是自負盈虧的。香港明愛有着各類服務，但不是全都獲得恆常的資助。既是採用自負盈虧政策，賺得利潤，便可用作支持明愛的開支需要。黃先生指出社區及接待服務的對象是普羅大眾，服務設施大部分設在明愛的服務中心內，服務對象就是明愛不同服務的使用者。社區及接待服務亦為明愛的成人教育和中學教育的學生提供實習機會。明愛賓館及餐飲服務亦為一些明愛特殊教育及康復服務的受眾提供工作機會，讓他們發展潛能。

總結在明愛服務的38年，黃先生感恩自己十分幸運，因為幾乎涉獵了明愛的各個服務範疇，包括社會工作服務、教育服務、醫療服務和社區及接待服務，亦在工作內外獲得了服務社會的機會。



源永樂醫生

源永樂醫生，香港明愛前醫療服務部部長，2020年退休。源醫生1982年加入明愛醫院，服務至2007年退休。從醫院退休後，源醫生加入香港明愛，擔任醫療服務部部長，後來兼任寶血醫院院長，前後服務明愛38年。

源醫生當年由澳洲回流香港，有一位明愛醫院的外科醫生邀請他加入。他考慮到明愛醫院是一所大醫院，而且坐落於較為基層的深水埗區，在明愛醫院工作，能幫助到更多普羅大眾，所以便應允加入，結果一做就是25年。在職期間，他曾擔任醫院的急症室和外科主管，亦認識了力理得神父和明愛醫院管治委員會的委員。源醫生退休後，由於對於明愛有一定的了解，便應楊鳴章主教邀請加入香港明愛。

談到楊主教，源醫生覺得楊主教有敏銳的觸覺，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富於冒險精神，例如楊主教決定重開寶血醫院（明愛）婦產科，為當時牀位短缺的「雙非」和本地孕婦帶來希望，而婦產科的需求亦提升了寶血醫院（明愛）的使用率。

關於明愛醫院各個時期的特色，源醫生指出明愛醫院由教區和明愛創立，早期的營運經費主要是靠募捐而來的。源醫生記得自己加入明愛醫院當外科醫生時，醫院規模不及現在，當時只有一個綜合的收症室，沒有現時這樣完善的急症部門，大部分病人只是經過初步的診斷和分流便收入病房。後來，隨着政府要求明愛醫院將服務擴大，醫院才增設了急症室，他亦成為了急症科醫生。因為病人實在太多，加上醫療本身是一樣昂貴的服務，單單靠各方面的捐助難以滿足病人的



源永樂醫生喜見明愛不斷引入多類醫療服務



源永樂醫生對明愛醫療服務的發展貢獻良多

需要，正巧當年政府希望整合全港的醫療系統，以便更好地分配醫療資源，所以明愛醫院便加入了新成立的醫院管理局。

明愛醫院歸入公立醫院系統後，明愛又接手管理兩所私家醫院——寶血醫院（明愛）和嘉諾撒醫院（明愛）。源醫生指出當時接管兩所醫院有不同的原因，也面對不同的營運方式上的困難。嘉諾撒醫院（明愛）因位於半山，當區有不少能負擔較高醫療費用的居民求診，明愛接手時，醫院能自負盈虧，但卻需要引進更先進的儀器。至於寶血醫院（明愛），由於坐落本港較貧困的深水埗區，而且原先是一間孤兒院，其後才改成照顧當區婦女的產科醫院，宗旨是照顧貧窮人士，收費務求低廉，所以在經營上有很大困難。明愛在接管後，源醫生積極與政府部門和醫院管理局商討「公私營合作」的模式，一起合作發展醫院。可惜的是，礙於當時政府對使用公帑支援私家醫院有保留，明愛便轉而積極向各個慈善基金會尋求合作和支持，讓醫院持續運作下去。

源醫生期望未來明愛的醫療服務可透過參與更多公私營合作，同時配合國家的政策，獲得更充足的資源，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李國維醫生

李國維醫生，香港明愛前醫療服務部部長，2020 年加入香港明愛，2022 年退休。加入明愛前，李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了 30 多年，曾任瑪麗醫院副行政總監。

李醫生加入明愛，是屬於計劃之外的事。當時他已從瑪麗醫院退休，正在做一些兼職工作，有教友介紹他認識明愛總裁閻德龍神父。他與閻神父傾談期間，獲邀接任醫療服務部部長，自此便成為明愛大家庭的成員。

李醫生指出，明愛的醫療服務與公營醫療有同有異，相同的是大家都會為病人治病，但明愛的醫療服務更強調多走一步，照顧病人精神和靈性上的需要，講求人性化地照顧病人。

至於明愛醫療服務成立至今的變化，李醫生認為明愛醫院在 90 年代初歸入醫院管理局是一大轉變，因為明愛醫院正式成為了公營醫療體系的一部分。自此，明愛醫療服務可以更着力發展兩所私家醫院——寶血醫院（明愛）和嘉諾撒醫院（明愛），以及牙科診所。這些醫院和診所，今天在不同的地區，致力為不同的社會階層提供服務。

擔任醫療服務部部長期間，主要工作之一是加強兩所明愛管理的私家醫院在公私營合作醫療上的參與，其中「全膝關節置換手術」資助計劃是一項重要標誌。自 2019 年開始，寶血醫院（明愛）多次獲得李嘉誠基金會資助手術的費用，而從 2023 年起，資助計劃改由浩洋慈善信託基金支持。這項資助計劃已為數百名在公立醫院輪候多年的病人置換膝關節。此外，2022 年起，嘉諾撒醫院（明愛）獲得大鴻輝慈善基金捐助，讓在公立醫院輪候的非緊急冠心病病人，以公立醫院的收費，進行俗稱「通波仔」的球囊冠狀動脈成形術。這些計劃促進了明愛管理的私家醫院與公營醫療系統的協作，不但可以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同時提升了醫院的使用率。

李醫生對明愛的醫療服務寄予厚望，他表示除了治病，更希望「患者在接受明愛的服務期間，接收到愛的訊息。」展望將來，他認為明愛的醫療服務會與時並進，持續回應社會的需要，例如針對人口老化問題，發展老人科、內科、骨科等，進一步服務市民。



雖然在明愛服務的時間不太長，但李國維醫生為明愛醫療服務的將來發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許德輝先生 陳德權先生

許德輝先生，是「明愛之友」創會主席。許先生憶述前總裁力理得神父經常提到，明愛機構是實踐天主教宣揚和推廣愛的運動。他深受力神父打動，決定協助推廣明愛的服務精神，於是他聯同七位教友，成立了「明愛之友」，並獲推舉為創會主席。他指出後來加入的明愛之友，多數是堂區的教友。

1996 年，「明愛之友」成立時，有八位創會會員，許德輝先生是其中之一，曾先後擔任第一、二及五屆主席：分別是 1996 至 1998 年、1998 至 2000 年、2004 至 2006 年。陳德權先生經許德輝先生介紹，在 1997 年加入「明愛之友」，2018 至 2022 年底擔任主席，履行了兩個任期。

陳德權先生談到「明愛之友」的籌款工作，自有一番體會。他表示籌款工作並不容易，為了增加外界對明愛工作的認識和認同，「明愛之友」舉辦了不少探訪日，讓會友及善長到訪不同的服務中心，親身了解明愛的工作。各界的支持使各項籌款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特別是「明愛暖萬心」慈善晚會，使明愛的知名度大大增加，近年，更有善長提供配對捐款，令善款數字大增。

參與一項工作長達 20 多年，殊非容易，更何況是志願服務。究竟如何才能服務 20 多年仍孜孜不倦？兩位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與自身的信仰有關。如許先生所言，明愛之友「運用自己的網絡，去宣揚明愛的精神和服務。用自己的行動去活出信仰，為福音作見證。」

2023 年，香港明愛成立七十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兩位前主席對明愛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一些寶貴的建議。許先生指出明愛在各方面的服務已非常出色和專業，可以在服務過程中多引領受眾認識天主，以彰顯天主的大愛。他又認為近年大灣區發展蓬勃，明愛亦可考慮推廣服務至大灣區，讓更多人受惠。陳先生則着重明愛的地區服務，他表示不是所有的堂區附近都有明愛的地區事務協調辦事處，令部分教友未能適時取得明愛服務或活動的資訊，所以在地區服務與各堂區之間的聯繫和合作上，有優化的空間。



左起：許德輝先生、陳德權先生



馬基先生太太

馬基先生，是退休公務員。退休後，接受時任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邀請出任行政秘書（現稱行政事務主管）。他的夫人隨後亦在明愛開展義務工作，曾服務於堅道明愛中心和明愛醫院，現時在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繼續當義工，至今逾40年。

談到加入明愛的經過，馬太太娓娓道來。已退休的馬基先生有一天，收到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的邀約電話，由於他們是公教家庭，他便應邀到明愛總部與力神父見面。原來神父希望馬先生能擔任明愛的行政秘書，馬先生當場答應了。自此，當時作為家庭主婦的馬太太便每天駕車送丈夫到明愛上班。其後，有明愛同事建議馬太太也在明愛當義工，她想到當時兒子已在國外留學，既有



馬太太在明愛擔任40多年的義工工作

空餘時間，也爽快答應了。在過去40多年間，馬太太先後在堅道明愛中心的工藝社、明愛醫院和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服務。講到如何持之以恆，擔任40多年義工，馬太太說：「主要是做義工帶來的歡樂和滿足感，若果人不是為了金錢而工作，反而可以更加放得開，更加投入。還有，不要害怕自己能力不逮，不要害怕失敗，只要踏出第一步，就會越做越好。」問及做義工40多年間一些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馬太太跟我們分享了兩件事：「當年在明愛醫院做義工時，醫院聘請了一位外籍足部治療師。當長者知道由外國人來診治，便擔心難以溝通，並感到害怕。醫院便安排我們陪同治療和協助翻譯，長者因此鬆了一口氣，可以放鬆心情接受治療。」

「另一件是有關最近六、七年才成立的惠賢義工隊。我們到不同的長者院舍為長者按摩和提供娛樂表演。我們運用從義工訓練課堂學到的知識，替長者按摩手腳。原來部分長者從來未接受過按摩服務，那時我們幫助他們紓緩痛楚，令他們非常開心，亦使我們感到滿足。在這兩年，這項服務因為疫情而暫停，我覺得很是可惜。」

當了40多年的義工，馬太太深深體會到義工的重要性，而她認為令義工留下來服務的，是明愛職員的服務精神。「以安老服務為例，不少項目沒有得到政府支援，若果缺少了義工的參與，

職員即使用盡全力也不能完成。正因為職員的投入，驅動我們的向心力，令我覺得自己是明愛的一分子。舉例說，深水埗雖然是人所共知的貧窮社區，但我們中心連續11年成為安老服務當中籌款額最高的中心。中心的會員覺得自己要付出，於是在中心做運動時也呼籲其他人捐助。眾志成城，自然就會有好成績。」

談到自己的目標，馬太太期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繼續為長者中心貢獻自己的綿——綿——綿力，是一件十分值得的事。總比起每天坐在公園，左看看、右望望，一點寄託也沒有來得有意義。」



李秋儀女士

李秋儀女士，明愛安老服務社工，是明愛陳震夏元朗職業先修學校（今稱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的畢業生。李女士完成中五課程後，先後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然後在明愛專上學院修畢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

談到如何接觸明愛，李女士說自己由幼稚園到小學，一直在天主教學校就讀，其後順理成章入讀了明愛陳震夏元朗職業先修學校。中五畢業後，做過幾份不同種類的工作。2003年，香港受到非典型肺炎的影響，明愛獲得撥款聘用清潔工為元朗區的長者進行家居清潔。當時待業的李女士受到媽媽的鼓勵，便一起應徵並成功獲聘。這給了她一次意外的發展機會。

「上司見我年青，工作態度認真，於是問我是否有興趣做一年合約的活動助理。我想，反正沒甚麼工作方向，既然得到上司邀請，就應承了。其實我只是做了兩天清潔工作。幾年後明愛開展了『寧安服務』²，我就調升為活動幹事。」

在寧安服務工作期間，李女士照顧的是踏入人生最後階段的長者。在工作過程中，她有很深的體會，亦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她記得曾經有一位患上長期疾病，脾氣暴躁，但沉默寡言的伯伯的一次奇怪的舉動。「他突然邀請我到他家裏喝茶，我沒多想原因就應約前往。我從來不知道他懂沖泡功夫茶。我們一邊喝茶，他一邊透露自己在醫院留醫期間，因一時衝動打傷鄰牀病人，現在惹上官非，非常擔心。我即時安慰他，勸他不用擔心……想不到他翌日就輕生了。」這次經歷讓李女士了解到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不足，有些人突然做出異常的舉動，便可能是輕生的先兆。這次意外沒有令她感到氣餒，反而促使她更加用心服務。其後，她獲得上司的支持，在擔任寧安服務活動幹事的同時，回到明愛的學校進修，先後完成了毅進課程和高級文憑。



由清潔工到明愛專上學院完成社工課程，李秋儀認為明愛一直陪伴她成長

為何選擇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李女士這樣回答：「與其他院校的社會工作課程比較，明愛的收生要求較有彈性。以我為例，讀書成績並不突出，曾經以為社工這類『專業工作』是遙不可及的。幸得上司認為我擁有接觸長者、關懷長者的實際經驗，建議我報讀明愛課程。其後果然獲得明愛取錄。我就先後完成兼讀制的毅進課程和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並順利成為註冊社工。」

完成社工課程後，李女士選擇繼續在明愛安老服務工作，曾服務於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和明愛天悅長者中心，而現時是在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工作，擔任長者支援服務隊社工。談到為何選擇在安老服務工作，她表示，她很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幫助長者改善生活情況，並分享了一些經驗。

「有一位年青時很有本事的婆婆，因患上認知障礙症，在日常生活遇到不少困難，例如她在取得政府津貼後，很快便花光，最後連一日三餐都不能維持。最初，我本想代她管理金錢，但覺得不太合適，於是教她把津貼先分成多份，按不同需要取用。她的病況反覆，有一次八號風球，她走到街上也不自知，幸好被醫務社工遇上，才被送回家中。家人最後決定把她送往安老院。婆婆現時住在院舍，情況大有改善，更協助姑娘照顧其他院友，變成一位領袖。」

這些成功的經驗大大加強了李女士的信心，她期望能讓更多長者可以安享晚年。談到未來的目標，她期望用自身的經驗讓其他人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我出身於基層，以前從沒想過自己可以跟『專業』拉上關係。現在我就是一個『人版』，人可以改變自己的未來。我希望可以鼓勵更多同路人，不要侷限自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其他人。」



李秋儀女士（左二）收到天悅長者中心長者所送的親筆對聯作為調職送別的禮物

² 寧安服務透過為沒有子女的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訂立後事安排，為無依長者達成未了心願，讓他們安享晚年。（參考網址：https://www.caritas.org.hk/zh/?page_id=8576）



余金汶女士

余金汶女士，明愛樂恩中學畢業生。余女士原先就讀第一組別中學，因為學習壓力太大，失去學習動力，於是到明愛樂恩中學修讀短期適應課程³。修讀完短期適應課程後，她選擇留在明愛樂恩中學完成中學教育，其後升讀明愛專上學院的配藥高級文憑課程。

談到為何會決定正式轉到樂恩中學讀書，余女士憶述自己本來在另一間中學就讀，但因學習壓力沉重，失去學習的興趣，慢慢無法跟上進度，並出現了情緒問題，與家人相處亦開始有些不協調。在學校社工的安排下，余女士到明愛樂恩中學就讀短期適應課程，希望尋回學習的興趣。初時，她並沒有考慮留在樂恩完成中學課程，只是當作重讀一年中三。樂恩學校推行每班最多 12 人的小班教學，並且是寄宿學校，所以老師和社工對每一位學生的情況都會較主流學校更加關注，亦能照顧每位學生之間學習進度的差異，而學習氣氛也更為融洽。余女士指樂恩的學生均被老師的熱誠所感動而投入學習，每位學生都會有一、兩位特別喜愛的老師，在完成中三課程後，她與家人決定留在樂恩完成學業。

余女士在樂恩的另一得着是與家人的關係好轉。到樂恩初期，她與家人見面時仍會有爭執，但經過社工的開導，情況逐漸有所改善。位於彩虹的樂恩學校與屯門的家距離較遠，但婆婆經常長途跋涉來回三小時前來探望，令她深受感動。因為相處機會少，大家反而更珍惜見面的一分一秒。

講及為何會選擇在明愛專上學院繼續升學，余女士坦言當時她報讀了幾所院校，亦有其他院校取錄她，但她最後決定選擇明愛專上學院，主因是對明愛的教育有信心。在樂恩的學習經歷，



余金汶女士（右）被樂恩中學的老師熱誠所感動而重拾學習的興趣

令她深深體會到明愛的老師均投入工作，熱誠教學，盡力照顧每一位學生。她說升讀明專後，一班有超過 100 位學生，老師當然不可能像樂恩一樣，照顧每一位同學，但是，科主任到了第二學期已可叫出每一位學生的名字，其他老師亦會在課後抽空與學生交流和了解他們的情況，令她感到明專的老師十分用心教學。

談到未來，她期望在本港的醫療體系服務，運用她在明愛所學的知識，貢獻社會。

³ 「短期適應課程」是群育學校為有情緒問題或預期有問題學生提供的一項課程。課程為期三個月至一年，必須由主流學校轉介入讀。修讀期間原學校會保留他們的學籍，當學生的情況有改善，又希望重新回到原校上課，便可返回原校繼續學業。



陳太太

陳太太，明愛樂幼學前教育及訓練中心學生家長。陳太太的兒子 Eugene 差不多三歲的時候，她發覺兒子與其他同齡的小孩子有點不同，例如手腳不協調、不能用言語溝通、無法理解長指令，情緒也不受控制，於是接受醫生的評估。醫生採用韋氏智力量表評估後，判斷為輕度智障及自閉症譜系障礙。她得悉兒子的智商只有 63（一般是 100）及患有自閉症，便馬上到社會福利署為兒子排隊接受早期訓練，但輪候了一段時間，兒子依然未能獲得服務。當她知道堅道的明愛樂幼學前教育及訓練中心有學額，於是立即帶兒子到樂幼面見，並開始接受訓練。



2006 年，陳太太（左一）與兒子 Eugene 出席明愛舉辦的活動

陳太太記得兒子最初只懂玩玩具車，而且只會反轉車子用手撥動車輪，而聽到聲音就會尖叫回應，情況令人心酸。參加樂幼的早期課程時，治療師一對一教授 Eugene 如何「玩」，其後開始教他如何訓練手部肌肉和訓練協調性，並學懂聽指令，以及控制和表達情緒，嘗試聽到聲音而不會做出過大的反應。Eugene 在完成樂幼的訓練課程後，順利升讀主流小學。

除了為學員提供訓練和支援外，明愛的康復服務亦為照顧者提供各方面的教育和支援服務。陳太太憶述當時政府未有就「融合教育」提供足夠的支援，資源十分有限，幸好主流學校願意接納兒子入學。主流學校沒有實行融合教育的經驗，她記得兒子在升讀主流學校初期，面對不少問題。幸好她在兒子就讀樂幼的同時，已成為了明愛家長資源中心⁴的會員，當她向中心的社工提及兒子在學校遇到的問題，社工都會想辦法幫助，令兒子在一年級下學期已能適應學校生活。更重要的是，同學亦接納他，甚至成為朋友。小學畢業後，兒子升讀主流中學，雖然仍要面對學習上的困難，但她和兒子都沒有放棄。現在，兒子已就讀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她感恩明愛各方面給她的幫助，特別是明愛樂幼中心為兒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⁴ 明愛家長資源中心為殘疾或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及其家長和親屬提供專業及支援服務，如：個案輔導、兒童及青年活動、社區教育等。

陳太太認為明愛家長資源中心是一個值得向家長推介的組織。中心讓家長互相分享經驗和資訊，例如各種孩子需要的活動和治療，達到互相幫助的目的，家長和孩子都獲益良多。她記得最初加入中心時，有一位家長向會員分享心路歷程，讓她們知道孩子各有天賦，可向不同的方向發展，重要的是了解孩子可以通過適切的訓練得到改善和進步。陳太太至今仍是中心的會員，她樂意聆聽其他家長的喜樂和憂慮，也不吝惜分享自己的經驗，一起為孩子們的進步感到開懷。

談到明愛的員工，陳太太覺得明愛的員工都很用心服務，並會盡心盡力協助服務對象解決問題。若真的要她選出一、兩位令她印象深刻的員工，她會選金翠芬姑娘和陸潔玲姑娘。陳太太說，兒子初到樂幼時，便是由金姑娘跟進。陳太太當時對自閉症一無所知，在孩子接受訓練時，金姑娘會邀請家長也坐在一起，向家長詳細講解甚麼是自閉症和照顧者可能遇到的問題，讓他們早作準備。Eugene 在校期間，金姑娘一直與她保持聯絡，甚至 Eugene 離開樂幼後，亦持續了解他的情況。至於陸姑娘，陳太太記得她協助中心成員成立一個關注組，向政府表達家長的需要和期望獲得的資源；Eugene 升讀主流學校後，陸姑娘甚至親自到學校，向校方表達特殊需要學童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和協助老師解決 Eugene 的困難。

最後，陳太太希望向所有有特殊需要學童的家長說：「雖然孩子的路是崎嶇的，但是不要放棄。只要堅持下去，前景不會灰暗。我們的孩子會適應社會的情況，與其他孩子共同成長，最終定會找到出路。」



Tiffany

Tiffany，明愛「生命學堂」⁵計劃學員。Tiffany 曾是一名迷失少女，在朋友的推薦下參加明愛「生命學堂」計劃。在計劃中，她參加了一個非一般的「化妝培訓」，完成「生命學堂」計劃後，她不但為躋身專業化妝師打下基礎，也參與不同形式的分享活動，向中學生細說自己的經歷。

談到如何接觸明愛的服務，Tiffany 憶述自己一度是反叛少女，曾經打架、有用藥問題、入獄。後來，她有朋友參加了明愛「生命學堂」計劃，從朋友口中得悉此計劃為參加者提供各類職業培訓和生命故事重組成長互助活動，而計劃中有化妝班。她當時對化妝技巧有興趣，便去報名參加。Tiffany 記得她臨近截止才交報名表格，幸好獲得安排面試，並被取錄為學員。負責 Tiffany 個案的社工許曼瑩姑娘補充：「當時計劃的目標對象是有用藥問題的少女，面試的目的是希望確認報名者是否目標對象，以及了解她們的個人經歷。」

獲得取錄後，Tiffany 順利分配到學習新娘化妝的組別。計劃除了教導學員化妝技巧，亦安排她們到與計劃合作的公司實習，讓她們接觸業界人士，了解行業的發展和實際工作情況。Tiffany 幸運地被老師揀選為化妝助手，為她日後成為專業化妝師創造了條件。Tiffany 認為相較化妝培訓，對她影響更大的是計劃舉辦了互助小組，小組成員互相支持，加上社工像家人一樣關心她，讓曾經失去人生方向的她學懂了如何愛自己、處理人際關係、訂立目標，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Tiffany 最終順利完成培訓，一直朝着成為專業化妝師的方向發展。除了新娘化妝造型外，她更有機會為藝人、模特兒化妝。許姑娘認為 Tiffany 有今天的生活，除了明愛給予機會，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的堅持和爭取機會。



Tiffany（右）與負責社工許曼瑩姑娘

計劃結束後，Tiffany 獲得多個機構邀請到學校，以朋輩輔導員的身份向中學生分享自己的經歷。她提到一次講座完成後，有學生寫在回應紙上鼓勵她說：「有這樣的經歷，不要緊。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令她深受感動。

雖然，明愛「生命學堂」已於 2016 年結束，Tiffany 亦不再是許姑娘的服務對象，但 Tiffany 仍繼續參與明愛的義工服務，回饋社會。

⁵ 明愛「生命學堂」計劃是一個在 2013 至 2016 年推行的計劃，計劃對象為 15 至 30 歲在職或待業的青少年，與他們一起尋找生命故事，探索職業方向及人生目標，學懂愛自己和別人。